

民族研究文集

第 一 輯



西南民族学院编

目 录

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点体会

.....杨绍全(1)

试论民族平等.....石农心(18)

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辩证关系.....杨绍全(28)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石农心(47)

试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李世佐(58)

对口支援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的有效途径.....张邦强 冯良勤(65)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李茂郁(73)

明代凉山地区的民族关系.....徐 铭(104)

凉山彝族人口的历史发展.....徐 铭(117)

十八世纪前期西藏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

——读藏文《颇罗鼐传》.....余万治 饶元厚(128)

略述珍珠链状的吐蕃赞普陵寝.....赞拉·阿旺 达瓦次仁(142)

川西北嘉戎藏族的土屯制度.....李家瑞(152)

藏族名称考略.....车 谦(166)

试论悬棺葬的族属及性质.....曾文琼(175)

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初探.....陈宗祥(187)

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陈泛舟(205)

秦汉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生产情况试探	陈宗祥 (214)
清乾隆初年茂州三齐羌民反对	
瓦寺土司的斗争	陈泛舟 (221)
一八五九年川黔边猫猫山苗汉人民起义	杨亮升 (230)
太平天国时期黔西北猪拱箐各族	
农民联合起义	陈德芳 (242)
台湾高山族的雾社起义	李全中 (254)
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现代少数民族爱国人物概述	刘德仁 (258)
川西北草地部落社会形态的调查	
——兼谈草地部落的社会性质	杨 明 (273)
试论川西北藏族游牧部落次生牧区公社形态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杨 明 (285)
彝族古代混沌说和清浊说探析	孟铸群 马廷森 (297)
苗族原始宗教试探	陈一石 曾文琼 (307)
“四川省若尔盖县牧工商联合企业”调查	
.....	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 (325)
凉山彝族自治州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情况调查	
.....	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 (336)
略谈民族文物工作	李家瑞 (348)
雄伟的气魄 不屈的斗志	
——神话史诗《勒俄特依》初探	李 明 (353)
谈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	李 明 (363)
试析羌族的古老神话	林忠亮 (378)
一支藏汉团结的颂歌	
——藏族文学中以文成公主入藏为	
题材的文学形式简述	马月华 (390)

民族民间文学对青年作家意西泽仁

创作的影响王 康 (406)

谈“蛇穴”、“鬼画”

——记昭觉县博石瓦黑古

石刻图像遗迹关荣华 毛瑞芬 (415)

论象雄张琨著文 玉文华翻译 (419)

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点体会

杨绍全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弄清民族问题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总规律的关系，掌握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民族问题规律，特别是掌握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性，对于胜利地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总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①后来，他们在1847年所写的《论波兰》、《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又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②“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马恩的这些光辉论述，揭示了民族关系、民族交往和民族问题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基石，是我们正确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所谓民族关系，就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相互关系的总和。我们研究任何事物，不仅要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而且要从“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④要具有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民族问题，不仅要从事物的内部关系上，而且要从民族的外部关系上，以及它们与社会发展联结的关系上去进行深入的综合的考察，才能深刻认识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更替，都是这一总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中，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无不受到其制约和影响。

民族这种社会现象，其特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除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主要的和基本的因素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民族产生和形成以后所发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亦毫无例外地要受到社会发展总规律的支配。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相邻的民族，或具有一定联系条件的民族，从来不是孤立的，一般说来，总是要发生联系和交往，这是社会发展，亦是一个民族形成发展的客观要求。马恩关于民族交往辩证关系的理论告诉我们，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联系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民族内外部关系与社会发展的状况亦是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即一定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该民族社会内部结构，影响到与异民族的交往状况，而民族之间的交往状况，又必然要影响到该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状况，影响到民族内部的各种联系和结构。我们感到有必要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一定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乃是决定该民族社会结构以及同异民族交往联系状况的基础。在原始社会的一定阶段，由于生产工具简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因而氏族、部落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不可能有交换。只是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社会的两次大分工，造成了剩余产品的出现和

增多，引起氏族、部落共同体之间交换的频繁发展，才促使人们共同体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质变：（1）它促使不同氏族、部落人们混杂居住起来，破坏了联系氏族、部落成员的纽带——血缘关系，而形成在更大范围内以地缘关系和某些政治、经济、文化为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2）它促使原始社会的崩溃瓦解。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马恩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社会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多，社会的分工亦日益细致，人们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必然导致民族之间交换的频繁，交换的范围日益广泛。因此，民族间交往的状况，是受该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的。总之，没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往来和交换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二，与一定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决定民族关系、民族交往的本质，它规定着民族交往的性质和状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必然产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即所有制关系的不同形式。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及其活动的方式，不仅决定该社会的上层建筑，亦必然要影响和制约着一切社会现象及其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⑤这就是说，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不仅制约着该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且也制约着民族交往的过程。任何社会现象，任何民族的发展过程，都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民族之间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的联系和交往，都是由各民族的物质生产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千百年来，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其实质是不断地交流彼此的“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

形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无论这种交往是采取和平方式，或战争方式，其根本的问题，都是居于统治地位民族的剥削阶级，力图向外输出其所有制关系，扩大其剥削范围，而被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则要极力保持其原有的所有制关系，他们又都总是要欺骗和愚弄甚至强迫本民族的劳动群众为其剥削利益而卖命，民族之间的隔阂、矛盾和斗争由此产生。在私有制条件下，存在着民族间不可避免的交往与这种交往方式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是在极不合理的状态下进行的。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所有制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因而民族间的联系交往的状况，不仅畅行无阻，空前频繁，而且与私有制条件下的民族交往，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民族交往状况取决于一定民族的内部结构，而一定民族的内部结构又必然要受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影响。这就是说，民族间的交往，对一定民族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上的这种内部因素同外部条件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就我们国家来说，千百年来，由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各民族联系和交往的历史比较长，也比较频繁，自秦汉以来，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就已普遍存在和日益发展。就是那些被认为封锁性很强，地处边疆，身居闭塞山区的民族，同祖国内地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亦是比较密切的。例如：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解放前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四周崇山峻岭，山高水险，解放前要进入凉山十分困难，被认为是封闭性很强的社会，但彝汉民族交往亦未间断，这不仅反映在居住分布在大小凉山的边缘地区，有不少地方是彝汉杂居，而且在大小凉山的腹心地区，尚有汉族居民，亦有不少汉商的足迹。彝汉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早就存在，据《雷波厅志》上说：凉山“田土

肥美，物产饶沃”，“商贾流通”，从未间断，仅县城东北的“中山坪、罗三溪两场，商贾云集，采办铜铁厂及茶丝筍木各物最为富庶。”而在城西金沙江畔的冒龙田高广场，虽沿途“山路险窄，峭壁悬崖，舆马不能过”，然而“每逢场期，汉彝赶集者七八百人。”⑥又如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地区，自唐宋以来，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规模也很大，明朝洪武年间，仅官市交换额一年即达茶叶五十万斤，马一万三千多匹。⑦就是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攸乐山的基诺族，人口仅四千人左右，身居闭塞的山区，解放初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但长期以来仍保持着同祖国内地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密切联系，至今，个别基诺人还保存有清代的上百两纹银，解放前同汉商及其他民族的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也不少。至于我国广大的西北、西南地区民族的茶马互市，则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时期以来，内地的铁木工具、瓷器、纸张、棉丝织品、盐米食品等与各兄弟民族的牛驴羊驼、皮毛制品、各种药材和土特产品，进行着广泛的交换。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少数民族把农作物品种和生活用品，以及某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发明创造、优秀的文化艺术传入中原，另一方面，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又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到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各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物质交换和生产方式的交流，必然要促进各民族内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其社会内部的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长期而广泛的交流，都影响和推动了各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我们中华各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讲，是我国各民族自身社会发展和彼此交往的结果。

综上所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以及民族问题的由来和发展，都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制约的。随着这个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和发展，民族的发展过程和民族的交往过程，亦必然显示

出若干不同的特点。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不仅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过程要显示出若干量的变化和质的区别，而且民族间交往的范围和密集的程度，以及交往的方式、性质和特点，亦是有所不同的。

必须指出，要研究任何事物并掌握其规律性，就必须在研究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努力掌握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正确认识事物，胜利解决问题的关键。社会发展总规律只能制约而不能代替民族问题的具体规律。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有其特殊的矛盾和矛盾的运动方式，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本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反映。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民族形成以后，它的特征，虽然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但是，它作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存在，一经形成后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在联系和团聚具有共同属性的人们共同体的作用上，具有相当牢固的凝聚力。因此，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一个民族要求其具有共同特征的人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合乎规律性的现象，而任何一个民族为了其存在和发展，又必然需要与异民族发生联系和交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方面有两个历史趋向：一方面是要求民族的平等、自主、自立和发展其民族特性的趋向；另一方面又要求民族的接近、联合、团结和发展基础上的融合的趋势，这就是民族问题的历史规律。当然，这两个相反的历史趋向，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决定的，是这一总规律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和要求。看来，这个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历史规律，在民族消亡以前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和特点（实质）不同罢了。

二、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特征及其规律性，亦研究并揭示了在这个历史时代民族问题方面的规律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⑧

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反映在民族问题方面这两个相反的历史趋向，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来进行分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分工的发展，出现了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不可能提供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那样丰富得多的社会产品来进行交换，同时，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上造成的社会封闭性、等级森严、割据局面、关税壁垒，以及奴隶主、封建主政权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等等，这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和条件，又不能不阻碍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间的联系交往，其规模和程度，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

只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特征因素，以及民族间联系和交往的状态，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它是人类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能提供比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高出无比的社会产品。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使之获得完全胜利，占居民族、国家和整个世界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无孔不入地到处去寻求原料、劳动力、投资场所和推销其商品的市场，不惜打破种族、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在客观上加速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民族四个特征因素的更加完备，促进民族意识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觉醒，只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产生才有可能，才会有民族运动；同时，亦必然加剧民族间联系交往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种民族间、国家间的频繁往来和联系，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在客观上造成加速民族接近、交往的倾向。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剥削和掠夺为前提的，又必然导致民族隔阂、分立的倾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追求永无止境的利润，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家及其政权，必然要推行民族歧视、压迫、剥削政策，必然要向外掠夺和扩张，要奴役殖民地弱小国家和民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间的接近、联系加强的倾向同民族要求分立、独立的倾向的矛盾，在交替和复杂的状态中进行着，这种在民族问题方面所表现出来两个相反的历史趋向，是资本主义固有规律的反映。

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而反映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两个历史趋向，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这两种趋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各资产阶级殖民国家内部的软弱和固有的不稳定的基础。”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它根本无法解决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合过程与这种联合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

为，帝国主义若不剥削和掠夺殖民地，不用暴力对殖民地弱小民族进行侵略和统治，便不能生存，也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而帝国主义在兼并和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在客观上就造就了各民族相互联系的条件，加速了民族交往的过程。然而，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却恰恰相反，根本不存在矛盾，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平等、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而各民族自愿联合的建立，只有经过殖民地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分立，经过变殖民地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实现。

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定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时，要把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即一个是封建制度崩溃的时代，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严格的区别开来。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要充分注意民族问题方面历史规律的作用，把它作为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纲领、政策的基础。

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是殖民统治的关系，因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方面的两个历史趋向，表现得十分充分和完整，列宁正是根据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情况，根据俄国民族问题方面的历史的规律，来制定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强调“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其民族纲领，并与沙皇的反动制度，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及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政策相对立，从而获得了各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他们反对沙皇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⑪这种同情与支持是苏联获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我们中国与苏联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长时期以来是个

封建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虽然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历史规律仍发生着作用，但它却显示出自己的若干特征，是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俄国的。从解放前的旧中国来讲，一方面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他们推行其反动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加之，外来侵略势力的挑拨离间，因而，在民族问题方面，就必然出现分立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里，各民族各地区有着历史性经济分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长久而密切的联系；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不仅在客观上加速着我国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密切联系和交往的进程，而且，因为我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掠夺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是受压迫的民族，都同处于殖民地被奴役的地位，这就造成我国各民族政治命运的一致性，各民族都联合起来，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而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斗争。上述诸因素和条件，充分说明，在我国历史条件下，近现代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出现了各民族更加紧密的联合过程。这种各民族联合斗争的趋势和要求，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并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后，就变成了强大的革命洪流而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最终摧毁了“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赢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民族问题方面，虽然确实存在着隔阂、矛盾和分裂的趋向，然而各民族的接近、团结和联合的趋向却是主流的趋向。我们党正是根据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根据我国民族问题方面的历史趋向，提出了不同于苏联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和纲领，这就是坚持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联合斗争，共求解放，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把在革命胜利后，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

内，切实保障民族平等，充分调动各民族人民积极性，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不象苏联那样，强调民族自决权，搞联邦制。我国历史的发展，已雄辩的证明，我们党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完全符合我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规律，因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

三、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不同，规律也必然各异。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我国的革命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可以大致做如下的表述，即：一方面，民族平等的实现，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觉悟的提高，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优秀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大发扬，各民族在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繁荣；另一方面，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随着民族间相互交往的更加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逐渐趋于一致，共同的因素日益增多，差别性日益减少，在遥远的未来，必将走向融合。简单说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就是：一方面是民族发展繁荣的趋向；另一方面是民族走向融合的趋向。这两个相反的历史趋向，它们相互影响，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发挥着各自的历史作用；然而整个来讲，第一个趋向，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占优势，第二个趋向，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及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阶段）占优势。

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要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规律出发，着眼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进行探讨。简单地类比，随意搬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方面两个相反的历史趋向，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条

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或者说列宁论述的两个历史趋向，还适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这不仅是极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列宁所讲的两个相反的历史趋向，是资本主义规律作用于民族问题上的表现，他指出的第一个趋向（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根本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实际；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来确立我们的指导方针，那就必然在实践上带来严重后果，必然要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规律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的条件是产生一定事物发展规律及其发生作用的基础。一旦条件改变了，那么，某一事物的规律，就将不复存在。作为社会事物发展来讲，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产生某种规律的条件改变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规律性亦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随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许多规律，将因失去存在的条件，而不发生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斯大林说，民族问题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主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⑫这就是说，不仅民族问题的内容和性质，而且民族问题方面规律的变化，都要取决于社会所有制的变化，取决于政权性质的改变以及社会革命的整个发展进程。一句话，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受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制约的。

从我们国家来说，随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的确立，阶级的民族的压迫剥削制度被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垃圾被清扫，这就使那些从前处于无权地位的被压迫民族，获得了彻底的翻身和解放，并为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前提，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震撼了世界，唤醒了千百万人民，亦必然给各民族以新的觉醒。由于各被压迫民族在获得解放后觉悟的提高，自信心的增强，要求其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并要求获得其在自身特点基础上的繁荣，则是必然的现象，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因此，民族问题方面的第一个趋向，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生产，它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它能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从而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出无比的生产率。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必将进一步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间的一切隔离状态，加速民族间的接近和交往的进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毫无阻碍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密切联系和交往，其规模和程度是社会主义建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比拟的。这种反映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民族接近、联合，共同性日益增多，差别性日益减少，并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逐步走向融合的趋向，是社会主义固有规律的又一个必然反映。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既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又为各民族之间毫无阻碍的密切联系和交往创造了前提。因而，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必然发生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互通有无，相互帮助，彼此学习，共同发展；各民族必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共同性愈来愈多，民族融合的因素会不断地由量变的积累而发展到质的变化，并将在社会